

我的新闻生涯

(第一卷)

全国新闻职称改革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编杭州编

中国新闻出版社

我的新闻生涯（第一卷）
全国新闻职称改革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编辑组编

*

中国新闻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白石桥路42号)

地质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毫米1/32，印张14.125，插页2，字数354千

1988年10月第1版 1990年9月第3次印刷

印数：15100—18100

ISBN 7-80041-103-6/G·90

定价：平塑5.00元，精装8.00元

目 录

序言.....	(1)
记者生活四十年.....	田 流 (1)
我的记者生涯.....	柏 生 (19)
乐此不疲四十年.....	卢 云 (32)
我走过的路.....	金 涛 (45)
在战火纷飞和风云变幻的年代里.....	纪希晨 (61)
冲上“四化”建设的主战场.....	高 峰 (74)
记者生活九章.....	陈勇进 (87)
记者答记者问	艾 丰 (102)
艰难的长途跋涉	金 凤 (112)
经济报道工作中的感受	夏华乙 (128)
一个理论编辑的回忆与思考	沙 英 (141)
在革命实践中成长	蒋元椿 (154)
用点和线描出经济政治的波纹	朱育莲 (168)
新闻生涯的片断回忆	舒 展 (181)
编辑工作断想	苏双碧 (195)
南海学泳	李承邵 (206)
一条艰辛而欢乐的路	高 羽 (218)
站在最高点 钻入最深层	李 峰 (230)
看透“上头”、“下头”、“外头”	叶世涛 (244)
科学家是我的老师	顾迈南 (258)

一个从事国际报道工作者的足迹	谭岱生 (271)
跟上时代 深入生活	徐 熊 (284)
超越自我的拼搏	冯建伟 (296)
我和人民广播事业	杨兆麟 (309)
“在听觉艺术的世界里”	王芝芙 (323)
战斗在新闻电影工作岗位上	牟 森 (336)
我爱“小儿科”	蔡宇征 (356)
经历片断 思考点滴	罗弘道 (370)
体育广播——我热爱的	张 之 (380)
我和蒙语文艺广播事业	赛 西 (391)
半路出家谈漫画	方 成 (401)
化瞬间为永恒	吕相友 (412)
理想·事业·追求	郑震孙 (421)
我热爱新闻摄影	李可明 (435)
编后记	(446)

记者生活四十年

田 流



四十多年来的记者生涯中，如果说我做了一点工作，写了一点东西，那完全是党培养教育的结果。

1945年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后，我就走上新闻岗位，到《晋察冀日报》当了记者。

遇到了一位好领导

记得我和我的爱人到达报社编辑部时，我的老上级胡开明同志一一向我们介绍了张帆、肖白、仓夷等同志。最后他说：“老邓是值夜班，他叫我告诉你们，下午来看望你们。”话音未落，一位身材颀长，面孔白净，显得有点瘦弱的人，文雅地走了进来，笑着说：“睡不着，起了个大早，你是田流同志吧，欢迎你们，今后我们就在一起工作了。”他，就是邓拓同志。我在早些年就听到过许多有关他的事情。很多同志告诉我，他知识渊博，才华出众，写作很快，常常是写完一页稿纸就叫通讯员送往排字房，通讯员从排字房回来，他的第二页稿纸也写完了，又送排字房。就这样，文章写完，小样也排出来了，他再从头到尾看一遍，仔

细审改一下，就定稿了。报上很多紧迫的重要文章和社论，都是这样见报的。

就是因为听到这些，慢慢地，邓拓同志在我心目中形成了一个令人十分敬慕的形象。在未见到邓拓同志前，我想象他一定是个热情奔放、风流潇洒的人。相见之下，他竟是这样朴实，这样和蔼可亲，这样平易近人。他穿着一身和大家一样的黑色棉制服，说话不快不慢，声音不高不低，每说完一件事或一个问题，总是停下来，两眼亲切地看着你，轻声问“是不是这样？”“这样做可以吗？”我当时对邓拓同志说：“同志们把我看错了，其实我做不了记者工作。”

“不，不。开明同志看得很对。”邓拓同志笑着截住我的话，说：“前天他在街上看到你们后，就从市委打电话告诉我，说你们到张家口来了，是我向中央局建议把你们调报社来工作的。”

我有些惊讶了。抗战八年我们一直做地方工作，从来没有同邓拓同志接触过，他怎么知道我们呢？

“前年秋天吧，你写的那篇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在敌人据点周围坚持生产的稿子很好嘛，新华总社还向各解放区转播了呢。”邓拓同志稍微停顿了一下，又亲切地接着说：“去年冬天，你写的那篇《赵贵说边区》，不仅正确地反映了抗日战争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从文章上看也是一篇满不差的散文嘛！”

邓拓同志是《晋察冀日报》社长、总编辑，还兼管着中央局宣传部很多工作。在我看来已经够他忙了，整个报社的行政工作，每天报纸的编辑出版，还要撰写重要文章、社论，每天都要工作十五六个钟头——却竟然对我这样一个普通的通讯员写的微不足道的小稿子也记得这样清楚！我解释说：“那些东西我只不过把实际情况反映一下，因为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从研究讨论到布置实行，整个过程都参加了。”邓拓同志说：“可当记者就不同了。”

“是不同。做地方工作因为自己是参加者、组织者，了解事物

的全过程，只要把自己掌握的情况，如实地反映出来就行了。”邓拓同志说：“当了记者就不一定每件事情都知道的那么清楚，不过也有办法，就是进行深入采访。你有实际工作经验，又有一定的写作能力，会把工作做好的。”最后，老邓还亲切地说：“咱们这里有不少有经验的老记者，可以向他们学习，他们会帮助你的。”

还遇到了更多的好同志

《晋察冀日报》社当时有11位记者，其中有六七人是原来就在报社工作的，其余是前两年从延安《解放日报》社来的。这些同志有一个共同点：从30年代就作记者工作，都有丰富的记者工作经验，都能很好地完成任务，写出使人爱读爱看的报道。

当时，我到报社的一个月里，翻阅报纸成了我每天最主要的工作：从报纸上细读老记者的作品，看老记者是怎样报道的。起初是逐天逐日看，以后又把所有记者的报道文章剪下来，归在一起，一个人一个人琢磨。他们写的新闻通讯文章，不仅数量多，而且各有各的特点、风格。张帆的通讯朴实中肯，就像他的人那样，忠厚朴实像个农民；秋浦从内蒙草原发回来的报道清新隽永，字里行间喷吐着草原的芳香；仓夷的作品才华横溢，但又淳朴亲切，毫无造作之气……。我在学习这些老记者的报道时，对他们知识的渊博，思想的敏捷，文笔的生动，羡慕得不得了。

时间最会跟人开玩笑，你想叫它走快些，它偏偏慢得要死。抗战八年大家全希望它跑快点，赶紧把日本侵略者赶走，可是它就是不听，一年好像等于好几年。现在我想叫时间慢点走——想向老记者多学点东西，想在采访前把准备工作做得充分些，时间又偏偏跑得太快。转眼，我调到报社已足足有三个月了。在这三个月里，我看了全体老记者撰写的解放张家口后的全部作品，

学着编了一个月的通讯员稿件，还在老记者带领下采写了几篇小稿子。但总不能老是待在家里学习吧，总不能老是领导出主意、提线索并让老记者领着采访吧，一个记者应该独立地进行采访。

“采访没有什么不能琢磨的奥妙，就跟你做地方工作出差下乡一样嘛！”很多老记者看出我的心思，热心地开导我。可我却有另外的想法：“过去那是下乡，去检查工作布置工作，见的都是熟识的干部和群众，可这是采访呵，是和素不相识的人打交道呵！”

“差不多。”同志们不厌其烦地向我解释：“你是党员，那些被你采访的干部大部也是党员，你想把他们的好经验、好成绩介绍出去，把咱们解放区的各项工作搞得更好，他们也是为了把工作搞好想从记者那里听到别处的好经验、好办法。三说两说，记者就同被采访的人说到一起来了，根本不像你想的那么复杂，不信你试试就知道了。”

不管我信不信，也不管自己有多少顾虑和疑惧，既然党决定我做记者工作，总得出去采访啊！1946年3月中旬，我终于第一次单独进行采访。

“要像给我写信那样写稿子”

真羡慕最近几年来参加党的新闻工作的青年人，他们都是大学新闻专业的毕业生，甚至有的还是研究生，就算有少数不是专科毕业的，也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而且早已业余钻研了新闻业务方面的知识。我呢？当初我对什么是“新闻”，什么是“通讯”都说不清楚，自认为：报纸上那些有两三行标题的就是新闻，一行标题的就叫通讯。记者的名字排在文章的前面或后面是新闻，排在题目的下面是通讯。我就照葫芦画瓢，短稿子就把名字写在前面，长稿子就起个一行题的题目，把名字写在题目的下面。有

蒙对的，但蒙错的更多。我从中琢磨其奥秘，但常常几天也找不到答案，苦恼极了。正在苦恼的时候，我接到爱人从编辑部捎来的信。信里没有给我提供报道线索，只是这样说：

“最近，编辑部专门讨论了你最近写的一些通讯报道，大家认为，你抓的问题还重要，分析的也还正确，看问题比较深刻，但语言枯燥，行文呆板，缺少吸引读者的力量……。”看来，她有些生气了，问：“你的文字过去不是这样呀，为什么现在写的这些东西竟这样枯燥无味，叫人读不下去呢？我希望你——不，要求你今后写的稿子，要像给我写信那样有感情、有趣……。”

这可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我从小喜欢文艺，爱看戏，爱听评书，爱听人讲故事，上学后刚刚认识了几百个字就爱看闲书。上高小后——就是现在的小学五六年级——就在一位语文老师、一位数学老师的引导下看巴金、郁达夫的小说。入中学后，我把自己的时间几乎全交给了图书馆，比较有计划地读了国内著名作家鲁迅、郭沫若、张天翼、巴金、曹禺……以及外国著名作家高尔基、托尔斯泰、普希金、雨果、莫泊桑等的作品。1941年，成仿吾为校长的华北联合大学在晋察冀边区成立，我又在它所属的文艺学院文学系学习了两年。因此，不少同志都夸我写的工作报告和工作总结生动、具体——这自然是在“山中无老虎”的情况下对我的称赞。

更深的苦恼缠绕着我。

苦恼变成了沉思，感情慢慢地冷静下来，我开始把做记者以来写的稿件，同过去写的东西做比较，同自己的日记做比较，又进而同自己写给朋友的信，特别是同写给爱人的信做比较。我突然像从黑夜山谷中走到了黎明的平原那样，感到编辑部同志的意见不但完全正确，而且十分深刻、中肯。我找出了自己毛病的症结所在：写新闻报道时生怕写不好，心情紧张，总是拿着架式

写，怎么可能写出自然、流畅、生动、活泼、又感人的稿子呢？在以后长期的记者生涯里，我逐步地体会到，要想使读者喜爱自己的作品，就要对自己的实际工作提出越来越严格的要求。有几点是很值得我们去努力追求的。

报纸不同于教科书。一个学生进入学校，必须读指定的教科书。报纸就不同了，要使读者愿意看，发生兴趣才行。这就需要了解读者的需要，写读者最关心的问题——这是从内容上说，如果尽写些同读者无关的事，他怎么会看你的稿子呢？！这是一。第二，不仅要写读者关心的重大问题，还要把这些重大问题尽量表现得深刻些，对读者有所启发，有所帮助。如果写的尽是读者了解了、懂得了的“不成问题的问题”，读者就没有必要看我们的报纸了。白浪费时间嘛！第三，还要有文采，要能够引人入胜。干巴巴枯燥无味，越看越头疼，文章自然就没有读者了。这就需要我们锻炼自己运用文字的能力，进而培养自己的风格。总之，我们的报道要作到真实、正确、深刻、生动，才能对工作有益，对读者有益，才会有更多的人读我们的文章。要作到这一点就要在采访上下功夫，就要有一种锲而不舍的追求精神，永不满足自己达到的高度。

50年代中，大概是1955年或1956年的春天，我忽然接到中国作家协会寄来的一份会员登记表，要吸收我为作家协会会员。我奇怪了，我只是一个记者，不是作家，怎么能参加作家协会呢？我一直拖着，不肯填这份表。三个月后，刘白羽同志亲自来找我，要我参加协会。我说，我只是个新闻记者不是作家，不配参加作家协会。他笑起来，说道记者和作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有很多记者就是作家。你的很多通讯、特写，就是很好的散文和报告文学嘛，填表吧，我作你的介绍人。就这样，我便成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了。可惜，直到现在也还没写出像样的文学作品。

上第一堂党的新闻课

1948年中秋节刚过几天，报社领导告诉我：中央要召开华北记者座谈会，要我也去参加。当时，形势发展很快，华北解放区已连成一片，晋察冀中央局同晋冀鲁豫中央局合并为华北中央局，〈晋察冀日报〉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定名为〈人民日报〉，我也就变成了〈人民日报〉记者。

革命形势发展出人意料得快，我的新闻业务能力却提高得很慢，两年来虽然写了一些新闻报道，而且数量也不算少，但思想上总觉着当记者不如做地方工作顺手，不如作地方工作作用大。特别是当时从易县去保定的路上遇见马敬贤同志后，思想更加矛盾起来。马敬贤同志是1938年我作区长时，找来的一位炊事员同志，遇见时他已是县公安局局长了。我背着行李走路，他骑着高头大马代步……我知道这种思想不对，冷静的时候也能克制自己，但一遇到困难或不如意事，就又苦恼矛盾起来。现在突然中央要找我们去参加记者座谈会，这满脑袋的思虑，一下子跑个精光。心想准是因解放战争已进入最后推翻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的战略决战前夕，要我们参加这一重大事件的报道，心里非常高兴。第二天一大早就背上背包，向中央驻地——平山县西柏坡村进发。报社离中央驻地只几十里路，下午两点多钟我们便跑到了中央驻地——西柏坡。还没等我们打开背包，少奇同志和廖承志、范长江同志就来看我们了。少奇同志一一同我们握手，问了每个人的姓名、何时开始做新闻工作等。他亲切地笑着对我们说：

“我们就要胜利了，有许多工作包括你们的新闻工作，需要研究在新形势下如何开展，所以让你们来开这个座谈会。座谈会嘛，时间可以从容些，当然也不能太长，有很多工作等着我们去做法呀。座谈会就是探讨会，就是谁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谁有什

么意见都可以说，你们提，你们谈。我们也提，也谈……。”

座谈会开得很活泼、很自由，提的问题非常广泛，从国际国内形势到党的各项政策，从学习、工作到生活，各方面的问题都提了。意见提的也不少。我把自己对新闻工作信心不足，仍想去做地方工作的想法也说出来了。

人在欢乐的时候，时间总是跑得很快的。我们的座谈会竟然开了二十几天啦。这中间少奇同志好几次来参加我们的讨论。最后他用了足足一个上午的时间，对我们讨论的问题和提出的各种各样的意见，作了系统的总结和中肯的解答。

少奇同志的发言中，不知道是不是针对我的错误思想和不健康情绪说的，可他的话确实解决了我最大的思想苦恼。就是他的话，使我进一步认识了党的新闻工作的性质、任务和作用，使我走上了以新闻为工具为人民服务的道路，而且自觉自愿地一直走到40年后的今天，并且还要继续走下去。

“报纸是党的耳目喉舌，是党联系广大人民群众의纽带。”少奇同志说，“没有任何一个部门、一种工具，能够这样广泛及时地把广大人民的斗争、群众的创造、群众的希望和要求反映到党的组织中来，也没有任何一个部门和工具，能够这样准确及时地把党的方针、政策和任务，告诉广大人民群众。全党都要重视报纸工作。你们，党的专业新闻工作者，更要热爱自己的工作……”

“报纸是党的耳目喉舌”，只几个字就把党报、党的新闻工作的性质、任务说得一清二楚了，而且多么确切、生动和深刻啊！

“党的专业新闻工作者更要热爱自己的工作。一个人在做这项工作，又不尽心尽力的去做，那算是个党员、是个革命者吗？”这完全是批评我的，这是多么热情的关怀和期望啊！我当时暗暗地滴下了泪。好像少奇同志知道我在想什么，接着又说：“当然，

做好党的新闻工作，困难是很多的。可，做什么工作没有困难呢？革命、前进、创造，就是克服困难嘛！”他用长江同志的例子来激励我们：“你们同长江同志比起来，条件好多了嘛，那时他在国民党统治区作记者，有国民党压制和迫害；你们在解放区，有党和人民的支持，同长江同志比起来，你们的困难少多了，克服困难的条件不知好了多少倍！”话题一转，少奇同志又谈到了党报记者，他说，“人民群众是把记者看作报纸的代表甚至党的代表的，因此你们要有一个好作风，一刻也不要脱离群众，特别是胜利了的党，变成执政的党，这问题就更重要了。”他警告说：“一个执政党如果脱离了群众，也会像安泰离开大地一样，被人捏死，胜利了的共产党也会被捏死的哩！”

座谈会上，谈论得最多最热烈的问题是无产阶级新闻观同资产阶级新闻观的区别，同志们列举了不下十几种不同和区别，少奇听了这些意见后说：

“都有道理。但根本的区别是真实与否”。他说，“我们无产阶级的新闻记者，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地分析具体问题”。最后他一针见血地说：“记者工作是独立的艰苦的劳动。”

“记者工作是独立的艰苦的劳动。”——说得多么确切多么深刻啊？

我们知道，记者的根本任务是采访和报道。记者每时每刻都在接触各种各样的事物。这些事物是真是假，有啥意义，将产生什么影响，应该歌颂它还是反对它等等问题，都需要记者做出自己的判断。

不言自明，记者工作中这个“独立”，绝不是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绝不是“无冕之王”。而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指导下、在党的正确方针路线指引下、在坚持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前提下进行工作。这是记者所应有的品德，应有的工作守则和工作

要求，应有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少奇同志要求我们——每个党报记者，都是一个正直的人，有原则的人和坚持真理的人。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应该以向党、向人民负责的精神，独立地艰苦地进行无愧于党报记者、人民记者称号的工作。

这次华北记者座谈会，是我上的第一堂党的新闻课，受的教益是多方面的。特别是少奇同志对党的新闻工作，对记者工作的许多意见更是我们做好党的新闻工作、做好记者工作的宝贵财富。

“不给你们出题目”

座谈会结束时，我们向少奇同志提出了一个要求：我们要报道些什么？

“不给你们出题目、提要求。”少奇同志非常干脆、果断地说：“群众的希望、要求、意见，就是你们应该报道的内容。”

当时，我听了很有点“不以为然”，领导不指明方向算个好领导吗？座谈会后，报社派我去临清市采访。

钻了八九年山沟，骤然来到临清，顿觉天宽地阔。几里长的街道两旁，商店林立，五颜六色的商品琳琅满目，往来行人比我在农村看剧团演出时还挤、还多。特别是码头前更是热闹非凡，各种船只往来如梭，桅杆如林。采访什么，报道什么呢？“群众的需要，意见和要求，就是你们报道的内容。”但群众的要求意见又是什么呢？只好到群众中去调查了。

临清市处于运河与卫河交汇处。由于水陆交通便利，成了鲁西北一个重要商埠，冀、豫两省的棉花，大部经这里运往青岛、济南、上海等地。我就采访这个城市的商业恢复发展情况吧。我当时想：只要商业搞得好的，临清就活了。

一天，两天，三天，我在市场上、码头上转悠，同店铺掌

柜、店员交谈，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买卖好做多了”，“解放军公买公卖，不用说跟敌伪比，就是跟事变前比，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当然商业的繁荣是一个报道的内容，但为什么大家说同样的话呢？他们看出了我是“公家”人才如此说的吧。后来，我改变了办法，去找国营商业部门，而且提问题换了个角度。当时，云集在临清市的国营贸易公司20多家，冀鲁豫、冀中、渤海、胶东、冀南等区的都有。我首先访问了临清市国营化茂公司，问他们：怎样发挥自己的领导作用——这是少奇同志在记者座谈会上给我们说的。当时解放区有五种经济形式：国营经济、合作经济、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等，国营经济是领导其他经济的。既然国营经济领导其他经济，那么我想，临清市的国营经济，对其他外区来市的国营经济也该尽地主之谊，起点领导作用吧。

“领导？没门，把个市场闹得乱糟糟的。”华茂公司的同志们说：“20多家外区公司，各干各的，都想抬购棉花，甚至不择手段地委托资本家抢购棉花。不光使棉价几天之内像脱缰的野马无法控制，而且那些资本家还将百分之十左右的棉花泼水弄潮，使国家收购的棉花质量大降，甚至发霉……”

听了这些情况，我心里亮堂多了。以后几天，我根据这条线索，对棉花市场作了较深入的调查采访，写了《临清棉价波动透视》这篇通讯。大概3000多字的报道登出后，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一时称为“临清事件”，成为党政领导机关和广大群众的谈论中心。新华社还发表了《临清事件与国营商业》的社论，全面系统地理论到实践对国营商业的性质、任务、作用和如何改革等问题作了深刻的论述。当时，因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解放日报》暂时停刊，新华社代行中央党报的任务。新华社的社论一发，全国各解放区的报纸都转载，影响很大。

从“临清事件”的采访中，我进一步理解了少奇同志对记者

讲“不给你们出题目”的意义，我才逐步体会和理解到，一个记者的根本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在现实生活中发掘应该报道的新问题和新事物。

天天生活在陌生的世界里

从临清采访回来，报社领导叫我去采访石家庄工业。

商业，像临清那样的大规模商业，虽然我过去没有见过，可根据地也有集市，也有商业，有买有卖，虽大小不同，其理一样。可工业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我只见过农村的铁匠炉，对现代工业一点不懂——连见也没见过。我去采访铁路工厂、大兴纱厂，进厂第一个印象是“没法办”。只见机器隆隆转个不停，工人聚精会神的站在哪里——我也不知道他们看什么，只是一个人也不理我，好像车间里没有进来一个人似的。正在焦急和无可奈何的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周扬同志想找你谈谈。”周扬同志是我最敬爱的同志之一，我敬佩他的学识，更爱他的为人。他当时是我们中央局的宣传部长，直接领导报社工作。他常到报社来同我们一同闲谈，也同我们一块散步一块玩，在“闲谈”和“玩”中，给我们很多启发和教益。接电话后，我马上去找他。三言两语，我就向他诉起苦来：

“我从没进过工厂的大门，报社要我报道工业，真是……”周扬同志见我急成那样，笑了。

“是啊！今后你还要报道很多你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事情哩！记者嘛，就要报道人们想知道的新事物嘛！”

“可我不懂呵！”在周扬同志面前，我从来没有一点拘束，总是有什么说什么。

“搞工业报道，生产技术要懂一些。”周扬同志听了我的诉苦后，又笑起来说：“但最主要的还是人，事情是人干出来的

嘛！要同工人交朋友。今天的工人同解放前有什么不同，他们对工厂对生产的看法、态度有什么变化？以及……”还没等他说完，我又插嘴了：“我去车间，他们都聚精会神地盯着机器不理我……”

“这就是变化呀，这就是解放了的工人阶级对待工厂、对待生产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呀！”周扬同志说话从来就是轻声细气的，见我愁眉苦脸，说话更柔和了，“工人和农民不一样，工业生产劳动和种田不一样，工人在劳动的时候不能像农民那样放下锄头同你谈，你可以在车间看工人怎样劳动生产，你也要到食堂、俱乐部以至他们家中去访问，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情趣，了解他们同家庭、同工长和厂长的关系。总之，记者不管采访什么，都不要忽略人，人是你报道中第一重要的内容。”

周扬同志那次谈话，使我很受教育。我在石家庄写的“解放了的石家庄工人”、“前进工厂在前进”等，都是受了周扬同志的这一启发。

事情真像周扬同志说的那样，记者的任务就是采访新事物，报道新事物。刚从石家庄回来我又被派往沈阳采访。没多久，朝鲜战争爆发了。10月间，我又随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别看在山沟里打了8年仗，可那是游击战，是小米加步枪，现在是立体的现代化战争，海陆空一齐来，不分前方后方、天上地下。一切都是陌生的。但我记住“人”这个第一重要的要素。在朝鲜战场短短的半年内，我写了几十篇反映志愿军和援朝民工的通讯。

在邓拓同志领导下做记者是幸运的。我们每次采访回来，他总是亲自找我们谈话，问我们在外边采访有什么困难，问各地的工作情况。这次从朝鲜回来，他跟我谈得更详细，先后谈了四次。他工作太忙，一次只能谈两三个小时，最后我又把曾向周扬同志提出的问题向他提了出来。他亲切地说：“周扬同志的意见很对。你看，我们的报纸叫新闻纸，报纸的工作人员叫新闻工作